

## 1683年臺灣棄留議的政治過程 及其歷史敘事的流變

黃宥惟

###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臺灣棄留議」在清朝政府內部的議政過程，並分析其運作方式及政治意義。1683（康熙22）年清朝軍隊擊敗鄭氏集團、控制臺澎地區後，展開是否統治臺灣的討論，是為「臺灣棄留議」。「臺灣棄留議」作為臺灣與清政權的第一個具體交會點，深切地影響著我們對清代臺灣史的理解模式。過往學界主要根據征臺將領施琅的《靖海紀事》，強調施琅留臺意見的重要性以及朝廷的不作為。然而，起居注的紀錄提供一幅相當不同的歷史圖像：早於施琅奏陳留臺意見前，朝廷已決定統治臺灣。《靖海紀事》與起居注敘述的差異，使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臺灣棄留議的政治過程及其歷史意義。

本文根據起居注等廷議紀錄，重新建構「臺灣棄留議」的政治過程。首先指出，康熙皇帝積極地掌握臺灣議題的議政節奏，而非被動受到施琅影響。接著，透過分析參與者的身分與層級，說明因北京政治脈絡與滿、漢族群考量，使得議政朝向「共識」的方向發展。由此注意到，滿人高級官員明珠積極地運用臺灣議題為自身創造政治機會、拓展人脈，很可能是議政過程的幕後推手；而施琅則在朝廷的指導下，完善了棄留議的共識過程。最後，本文注意到不同群體對於臺灣棄留過程存在著迥異的歷史敘事，而我們今日的普遍認知實則源自施琅一派在清初臺灣社會發展出來的說法。

關鍵詞：施琅、明珠、康熙皇帝、領土、臺灣

# The “Retention of Taiwan” Debate in 1683: A Political Process and Its Historical Narratives

Yu-wei Huang<sup>\*</sup>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volution of Qing government’s debate on whether Taiwan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empire, and analyzes the management of that debate as well as it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he Qing government started the debate after its army defeated the Zheng Family and took over the Pescadores and Taiwan in 1683. The debate lasted for some time and eventually led to the beginning of Qing rule over Taiwan. It was thus a pivotal point in Taiwan’s history during the Qing period. To this date the dominant narrative of this event has been built upon *Jinghai jishi* (靖海紀事) written by the Qing general Shi Lang (施琅), which highlights the important role Shi Lang played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hile portraying the Qing court as doing little regarding the Taiwan issue. However, another historical evidence, namely *Qijuzhu* (起居注) or the diaries of imperial actions and speeches, showed a very different picture. According to the latter, the Qing court had decided to retain Taiwan before Shi Lang first proposed such a move.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stances took by various factions at the Qing court that helped shape this critical decision.

This study utilizes *Qijuzhu* and the records of discussions at the Qing court in re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process leading to Taiwan’s retention by the Qing. Firstly, upon careful examination, the materials seem to indicate that Kangxi Emperor was actively controlling the agenda of the debate rather than passively influenced by Shi Lang’s opinion. This historical image contradicts the present narrative regarding Taiwan’s retention by the Qing. Secondly, by examining the social class-

---

<sup>\*</sup>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s and identities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debate, the study demonstrates how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had been shifting since the Qing conquest of China. As ethnic relations between Manchu and Han became a major concern during Kangxi's reign, the cour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started to favor a consensus of the two main ethnic groups in order to present a unified position of the Qing court. The study further notices that the Manchu high official Ming Zhu (明珠) was aggressive in the Taiwan discussions and fully utilized the debate to create his own political benefit, thus extending his personal social network. This suggests the possibility of Ming Zhu being a key figure behind the scene. Shi Lang's report on the retention of Taiwan was but one factor in producing a "consensus" of Qing court at the time. After the debate, however, various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the event emerged, and among them only Shi Lang's viewpoint became the source of a common description today.

**Keywords: Shi Lang, Ming Zhu, Kangxi Emperor, territory, Taiwan**



# 1683年臺灣棄留議的政治過程 及其歷史敘事的流變\*

黃宥惟\*\*

## 壹、前言

1683（康熙22）年夏天，清軍在澎湖海戰中擊敗鄭軍，瓦解鄭氏集團在臺灣的統治。隨後，清廷內部興起臺灣是否應納入清朝版圖的議論。對此，我們有一幅熟悉的歷史圖像：親自到過臺灣的清軍將領施琅（1621-1696），透過奏疏闡述臺灣島棄、留的利弊，並極力說服朝中官員支持留臺。朝廷幾經討論，最終因施琅〈恭陳臺灣棄留疏〉有力的論述，康熙皇帝（1654-1722，1661-1722在位，以下簡稱康熙）體認臺灣島的重要性，遂下令將臺灣納入版圖。在此敘事之下，

---

\* 本文為科技部大專學生計畫「由康熙廿三年朝議看臺灣納入清版圖的政治過程與歷史意義（1669～1684）」（105-2815-C-003-039-H）之部分研究成果，並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訪問期間完成。由衷地感謝三位審查人提供諸多具體的修改建議與提問，補足本人思慮不周之處，也讓本文主旨更加清晰。撰文期間承蒙林欣宜老師、李文良老師的指導與鼓勵，以及王亭方、朱曼云、孟令偉、賴盈如的悉心協助；又，本文曾在李文良老師主持的讀書會上報告，蒙學友提問指教，在此一併致謝。收稿日期：2020年2月20日；通過刊登日期：2020年5月27日。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棄、留臺灣議論的延宕顯然鑿因於康熙與朝臣猶疑的態度；<sup>1</sup> 進而，此一消極態度與清初「為防臺而治臺」的政策勾連，成為時人所認識的清初臺灣史特徵。<sup>2</sup>

當代對臺灣棄留議的理解大抵如此。儘管研究者們針對議論參與者的立場與臺灣的重要性有著不同見解，但普遍同意上述的歷史敘事。<sup>3</sup> 從今日的清史研究來看，清朝為滿人建立的多民族政權，在政事決議上，理應有著多方考量，而非僅憑施琅的一封奏疏而為之。<sup>4</sup> 若將臺灣棄留議一事置於此一歷史認識中來思考，則我們即可進一步探問，施琅對留臺方案的詳細陳述，在整個政治過程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其他官員又是在什麼樣的脈絡下參與議論？進而，施琅文集《靖海紀事》對於今日理解臺灣棄留議帶來怎樣的影響？

臺灣棄留議的課題很早就被研究者注意，也有可觀的成果。然而，從後現代的眼光來看，可以注意到過往論述陷於以下思考框架：一、研究者往往透過發言者的言論為其定位至「棄／留」的立場光譜上，並假定整體議論風向乃從「棄」逐漸往「留」移動，即施琅說服康熙的過程。這個印象源於康熙言臺灣乃「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sup>5</sup> 與施琅〈恭陳臺灣棄留疏〉的內容形成

<sup>1</sup> 這樣的觀點普遍存在於臺灣現行的歷史教科書中，反映我們對這些歷史知識的普遍理解。參見吳學明主編，《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第一冊（臺南：翰林出版公司，2018年），頁52；周惠民等編，《國民中學社會》，第一冊（臺南：南一書局，2019年），頁121；薛化元等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歷史》，第一冊（臺北：三民書局，2019年），頁490。

<sup>2</sup> 謝紀康，〈清季對臺政策的探討：從海禁到防臺〉，《臺南女院學報》，第24期（2005年10月），頁511-526。

<sup>3</sup> 孔立，〈康熙二十二年：臺灣的歷史地位〉，《臺灣研究集刊》，1983年2期（1983年9月），頁54-63；李祖基，〈論施琅《臺灣棄留利弊疏》的背景與動機—兼談清初臺灣的官庄及武職占墾問題〉，《臺灣源流》，第66/67期（2014年4月），頁146-173；石萬壽，〈臺灣棄留議之探討〉，收入林金悔主編，《滬汪·將軍·施琅—將軍鄉鄉名溯源暨施琅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縣：臺南縣將軍鄉公所，2002年），頁39-66。

<sup>4</sup> 有關清初朝廷政治的研究，可參見羅友枝（Evelyn S. Rawski）著，周衛平譯，《最後的皇族：滿洲統治者視角下的清宮廷》（臺北：八旗文化，2017年）；杜家驥，《八旗與清朝政治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林乾，《康熙懲抑朋黨與清代極權政治》（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

<sup>5</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康熙22年10月11日（1683.11.28），頁B007312-B007320。此處日期為陰曆、括號內為換算後

強烈對比，因而被不斷地增強。<sup>6</sup>二、對於整體進程的討論，明顯受施琅《靖海紀事》主導。儘管福建總督姚啟聖（1623-1683）的《憂畏軒奏疏》近年被發掘出版，研究者也注意到姚啟聖與康熙討論臺灣棄留問題的時間先於施琅，但最終仍將此事作為施琅敘事的配角。<sup>7</sup>事實上，鄭維中透過荷蘭、英國兩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指出，施琅在臺時曾以臺灣作為談判籌碼，與滯臺英、荷商人交涉，試圖鞏固福建商人與西洋商人的貿易關係，顯見其當時無意支持將臺灣納入清版圖。<sup>8</sup>此一事實告訴我們，即便是貌似「留臺」立場代表的施琅，也曾因若干因素改變其立場。進而，是否能以施琅《靖海紀事》中的敘述作為理解臺灣棄留議始末的根據，便有待商榷。<sup>9</sup>

兩則康熙與官員的對話紀錄，進一步揭示了思考臺灣棄留問題的另一條途徑。1684（康熙23）年2月3日吏部題補福建總督員缺，康熙向官員詢問可否將福建總督與浙江總督合併為閩浙總督。滿人大學士明珠（1635-1708）認為不可，並回應道：

〔明珠〕：「臣等之意，福建海寇近始投誠，臺灣等處又新設官員，凡是具係創制，且設總督理事，俟一二年後再裁此缺似便。」

上〔康熙〕曰：「閩省現有安插投降人員等事，仍設總督為宜。」<sup>10</sup>  
（粗體與〔〕內文字為本文所加，後亦同。）

在這則對話裡，明珠與康熙雖然旨在討論是否合併總督職位，但臺灣新設官員顯然已是其考慮前提。這則對話發生於1684年2月3日，而施琅那封著名的

---

陽曆，後亦同。另，清代起居注史料性質可參見莊吉發，《清代史料論述（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頁117-150。

<sup>6</sup> 陳碧笙，《臺灣地方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頁98。

<sup>7</sup> 陳在正，《臺灣海疆史》（臺北：揚智文化，2003年），頁114-118。

<sup>8</sup> 鄭維中，〈施琅「臺灣歸還荷蘭」密議〉，《臺灣文獻》，第61卷第3期（2010年6月），頁35-74。

<sup>9</sup> 石萬壽，〈臺灣棄留議之探討〉，收入林金梅主編，《滬汪·將軍·施琅——將軍鄉鄉名溯源暨施琅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9-66。

<sup>10</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22年12月18日（1684.2.3），頁B007583-B007584。



〈恭陳臺灣棄留疏〉卻要在4天後，也就是1684年2月7日才寄發。<sup>11</sup>一個月後，康熙在廷議場合提及施琅的〈恭陳臺灣棄留疏〉，當時漢人大學士李蔚（1625-1684）說道：

〔李蔚〕：「據提督施琅奏云：臺灣有地數千里、人民十萬，棄之必為外國所踞。奸宄之徒竄匿其中，亦未可料。臣以為守之便。」  
上〔康熙〕曰：「臺灣棄取所關甚大，鎮守之官三年一易，亦非至當之策。若徙其人民，又恐失所。棄而不守，尤為不可。爾等可會同議政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再行確議具奏。」<sup>12</sup>

上述這則對話中，李蔚據施琅奏疏，認為臺灣「守之便」；康熙認為此事「所關甚大」，但仍指出「棄而不守，尤為不可」。對話中雖然提及施琅的奏疏，然而對比康熙一個月前的言論，其立場並無明顯差異，這說明施琅的意見恐怕並非康熙決議留臺的唯一因素。過往以〈恭陳臺灣棄留疏〉為主軸的研究難以有效地解釋此現象。從廷議紀錄看來，北京朝廷在臺灣棄留上有著自身的脈絡，甚至很可能在施琅努力準備說服朝廷之時，朝廷已有統治臺灣的意圖。據此，本文嘗試跳脫《靖海紀事》提供的論述框架，從朝廷議政的角度來突破臺灣棄留議的課題。

為此，本文將臺灣棄留議過程中各色官員的意見放回政治脈絡中，透過闡釋官員言論與奏疏的意義，呈現綿密的決策過程。現存的紀錄已足夠讓我們重建此一過程，從中觀察北京朝廷、滿人官員對臺灣議題的操作，嘗試理解清朝入主北京後發展出來的政治結構與官僚網絡對臺灣棄留議一事的影響。此一政治過程的梳理有助於我們將許多看似矛盾的言論整合進同一個歷史裡，並解釋何以棄留議過程如此曠日廢時，以及重新評估施琅〈恭陳臺灣棄留疏〉的作用。

<sup>11</sup> 施琅，《靖海紀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59-62。

<sup>12</sup> 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第114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康熙23年1月21日（1684.3.6），頁176a。感謝審查人提示此資料。



## 貳、清朝歷史脈絡下的征臺行動

本節擬由清朝的角度重新檢視征臺行動，以釐清臺灣棄留議是在什麼樣的脈絡下進入朝廷的視野。這或許有助於解釋過往棄留議討論中的「清廷刻意拖延」的現象，即自1683年7月下旬攻占澎湖後，何以施琅幾封要求朝廷注意臺灣後續處置的報告都未獲得清廷的正式答覆。<sup>13</sup> 擴大比對征臺時序與廷議紀錄，讓我們注意到，有關棄留討論的紀錄密集地出現於安插鄭氏集團後，與安插前呈現鮮明的對比。這不應該視為刻意地忽視或拖延討論，我們都明白，鄭氏集團與臺灣引起的海寇與邊防問題，一向是康熙的心頭大患。因此，清廷的態度反差必然反映出鄭氏集團的安插有著某種階段性的意義。

眾所周知，澎湖海戰的失利無疑是導致鄭氏集團投降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整個過程卻相當地戲劇化。從戰爭報告來看，我們很容易認為施琅在澎湖海戰中徹底打敗鄭氏軍隊：在清軍壓境之下，鄭氏集團「不得已」只好遣人遞送降書。此般勝利印象，完全符合施琅與福建總督姚啟聖在軍情報告中所呈現的：清軍在澎湖海戰中大獲全勝，目前暫時駐紮澎湖，占領臺灣已指日可待。<sup>14</sup> 但情況並不如報告所呈現般的樂觀。事實上，施琅為了彌補澎湖海戰的嚴重耗損，暫時停止進逼臺灣；<sup>15</sup> 另一方面，福建總督姚啟聖的報告則反映了清軍的窘境，他稱：「查各鎮營將弁報稱，近日血戰，藥彈、炮子、噴筒各項，施放無遺，甚至鐵鍋等物撞碎繼用。」為此，他本人擔憂延誤戰事，還自行籌辦武器，「臣雖奇窮特甚，當此緊要關頭，不得不努力借辦，……共銀一萬零五百五十七兩四錢六分八厘」。<sup>16</sup> 由此可見，清鄭雙方的交戰結果，應是以清軍慘勝占據澎湖作結。此時

<sup>13</sup> 施琅，《靖海紀事》，頁26-37、45。

<sup>14</sup> 姚啟聖，〈為飛報鎮臣奮勇破賊捐軀我兵大獲全勝大敗海賊攻克澎湖事〉，收入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壹輯第八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頁371-373。條目名稱為叢書編者所加，名稱係源自原奏疏之事由，特此說明，後有引用本叢書處亦同；施琅，《靖海紀事》，頁26-37。

<sup>15</sup> 施琅，《靖海紀事》，頁28-34。

<sup>16</sup> 姚啟聖，〈為七日內捐造追繳臺灣器械事〉，收入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壹輯第八冊，頁392-395。

康熙雖然在外出巡，仍透過姚啟聖的奏疏了解臺灣的戰況。<sup>17</sup>

康熙謹慎督戰的態度，多少反映了清廷對征臺行動並沒有太大的把握。回顧清朝的征臺歷史，自1678（康熙17）年，康熙以24歲少年之姿平定三藩事變後，清廷便有意一併解決尚在臺灣的鄭氏集團。<sup>18</sup>然而，接下來幾年的備戰卻無法取得相應的戰果。連續幾任的水師提督都無多大進展，僅能控制福建沿海的島嶼而已，並未曾接近過澎湖，更遑論臺灣。1681（康熙20）年，康熙撤換了原本的水師提督，再次起用施琅，這是他第二度擔任福建水師提督。<sup>19</sup>施琅首度出任水師提督是在康熙初年，但後來因清廷改採招撫政策，主戰的他被召往北京。<sup>20</sup>如今再次赴任水師提督的施琅已經63歲，雖然擁有豐富的海戰經驗，但最初的表現亦不如康熙所願，甚至在前線與總督姚啟聖起了衝突。<sup>21</sup>從三藩事變至此，對康熙來說，征臺行動仍處於一籌莫展的狀態。在施琅與姚啟聖數度爭執的情況下，康熙在廷議時詢問大臣，大學士明珠奏曰：「若以一人領兵進剿可得，行其志，兩人同往則未免彼此掣肘，不便於行事。照議政王所請不必令姚啟聖同往，著施琅一人進兵似乎可行。」獲得康熙同意，由施琅專責征臺。<sup>22</sup>

隔年7月，施琅隨即立下功勞占領澎湖。從局勢發展來看，澎湖海戰的勝利與主導者施琅，可說是為清廷多年的宿願帶來一絲曙光。然而，康熙應該也相當明白，在真正地擊潰鄭氏集團之前，任何的戰果都可能只是暫時的。

儘管戰況長期不樂觀，但占領澎湖對清廷而言依然是個空前的成就，康熙對

<sup>17</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4冊，康熙22年閏6月20日（1683.8.12），頁B006980-B006982。

<sup>18</sup> 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第96卷，康熙20年6月7日（1681.7.21），頁1213a-1213b。

<sup>19</sup> 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第96卷，康熙20年7月28日（1681.9.10），頁1220b。有關施琅的一生，可參閱施偉青的詳盡考證，施偉青，《施琅年譜考略》（長沙：岳麓書社，1998年）。

<sup>20</sup> 施琅，《靖海紀事》，頁4。

<sup>21</sup> 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榕村續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703。

<sup>22</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3冊，康熙21年10月6日（1682.11.4），頁B006200-B006202。

此也難掩欣喜之情。澎湖海戰的捷報送到康熙手上後，他除了對施琅讚譽有加，同時也指示應將此事告知滿洲王公貴族們，並召來學士薩海（？-？）等，傳諭曰：「施琅大敗海賊，克取澎湖，此乃捷音。爾等可徧諭扈從八旗諸王、貝子、公等大臣侍衛各官知之。」<sup>23</sup> 由於康熙的肯定，施琅在朝廷的政治聲望逐漸高漲。幾天後，施琅也將澎湖海戰的詳細情況寫成報告送交北京；<sup>24</sup> 康熙在閱覽完畢後直言海上係他能力所不及處，稱：

自用兵以來，凡陸地關山阻隘，相度形勢以為進止，朕往往能懸揣而決。海上風濤不測，涉險可虞，是以朕不強之使進，數降明旨，言其難克。今觀奏內屢次殺賊，挫其鋒銳，火焚砲擊，沉其戰船，竟克澎湖，實為可嘉。<sup>25</sup>

除了口頭褒獎之外，康熙也給予施琅實質的支持。在澎湖整備期間，施琅曾題請朝廷給予許多臨時任命官員實質的頭銜，此事獲得康熙的批准，同時，為使接下來的征臺行動順利進行，也破例同意施琅提出的人事要求。<sup>26</sup> 儘管朝廷不久便發現施琅題補的人有問題，明珠說道：「前奉諭旨，因海氛未靖，凡施琅所奏事宜不許掣肘，一概准行，此乃皇上破格錄用。嗣後料無此錄用之例。」<sup>27</sup> 可見施琅題補人事，實為朝廷讓步的臨時舉措。

無論如何，這些行動仍反映出康熙對臺灣的積極關切。如同前面所述，清軍討伐鄭氏集團的軍事行動已持續一段時日，因為占領澎湖而出現曙光。為此，康熙在各方面也都顯得小心翼翼，他暫緩福建將軍題請的軍隊異動案，因福建係征伐臺灣的重要後勤基地，此時應當靜觀其變。康熙評論道：「澎湖乃臺灣咽喉之

<sup>23</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4冊，康熙22年閏6月18日（1683.8.10），頁B006978-B006979。

<sup>24</sup> 施琅，《靖海紀事》，頁26-37。

<sup>25</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4冊，康熙22年閏6月26日（1683.8.18），頁B006996-B006998。

<sup>26</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22年10月16日（1683.12.3），頁B007352-B007357。

<sup>27</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22年12月13日（1684.1.29），頁B007564-B007565。

地，克取臺灣即在旦夕。此本著暫留，可將朕意轉諭爾衙門大學士知之。」<sup>28</sup> 整體氛圍與前幾年的毫無進展大不相同。

然而，因多年對臺征戰失利，致使清廷對於戰事亦不敢過於樂觀。儘管像施琅這般獲得朝廷倚重的角色，也無法使此時的朝廷分神關注征服鄭氏集團後的臺灣棄留議題。施琅在剛占領澎湖時，便在軍情捷報〈飛報大捷疏〉中，提及臺灣後續處置的議題，他稱：

二穴〔澎湖、臺灣〕克掃之後，或去或留，臣不敢自專，合請皇上睿奪。或遴差內大臣一員來閩，與督臣商酌主裁，或諭令督、撫二臣會議定奪，俾臣得以遵行。<sup>29</sup>

施琅在此以「或去或留」的說法，提醒朝廷應重視臺灣相關的後續處置，同時施琅也表明此事非其所能置喙。康熙收到報告後，除了表彰征臺將士的辛勞外，並無對此做出正式回應。<sup>30</sup> 占領澎湖幾天後，施琅便收到鄭氏集團的投降請求，但他直覺地認為這只是緩兵之計。施琅將此事寫成〈賚書求撫疏〉向朝廷報告，言明當下仍應積極地準備征臺戰役。<sup>31</sup> 康熙對此表示認同，他與大臣們討論時，一位官員提到：

鄭克塽雖云投誠，並未言及剃頭、登岸。施琅已取澎湖，臺灣不久可得，彼〔施琅〕意亦不願招撫……。<sup>32</sup>

這則發言顯示出在清廷眼中，鄭氏集團是否「剃頭」與「登岸」，至關重要。「剃頭」關乎對清朝的政治認同，「登岸」則指鄭氏集團成員必須回到內

<sup>28</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4冊，康熙22年閏6月20日（1683.8.12），頁B006980-B006982。

<sup>29</sup> 必須說明的是，〈飛報大捷疏〉的大部分篇幅係在講述澎湖海戰的戰績與軍功，引文中的段落類似於額外陳奏之事。施琅，《靖海紀事》，頁35。

<sup>30</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4冊，康熙22年閏6月26日（1683.8.18），頁B006996-B006998。

<sup>31</sup> 施琅，《靖海紀事》，頁40-42。

<sup>32</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22年7月7日（1683.8.28），頁B007013-B007015。

陸。清廷的態度顯得小心翼翼，自1678年再度對鄭氏集團用兵，眼下看似即將征服臺灣，卻又不太有把握，凡事尚未底定，不便亦無需談論臺灣棄留問題。因此，朝廷並未回應施琅提及的派遣中央大臣來商議臺灣後續事宜的訴求。

然而，過了幾天，局勢的迅速變化打亂了清廷的步調：施琅在澎湖與鄭氏集團官員幾次往來後，確認其投降意願。在沒有先知會朝廷的情況下，施琅隨即派人前往臺灣招撫、監督鄭氏集團「剃頭」，並將此情形回報中央。<sup>33</sup>這樣的發展十分有趣，因為施琅幾天前在上一封奏疏中還信誓旦旦地要以武力進占臺灣。<sup>34</sup>負責後勤的福建總督姚啟聖也向朝廷表明支持鄭氏集團投降，康熙與大臣也一致傾向接受投降，否則任其逃到更遠的海外，勢必更難根除。<sup>35</sup>研究者們對於鄭氏集團投降的原因有過許多討論，但無論為何，清軍已能順利占領臺灣。<sup>36</sup>至此，既然鄭氏集團已經剃頭，清廷接下來便要安插其成員回到內地，即「登岸」；安插鄭氏集團成員遂成為朝廷共識，鄭氏集團的徹底瓦解僅是時間的問題。此時距離澎湖海戰不過一個月的時間。

朝廷得知鄭氏集團投降的消息後，康熙隨即發出一道諭旨送往福建，命令姚啟聖發表有關臺灣棄留的想法。<sup>37</sup>這是清廷首次對臺灣棄留議做出回應。姚啟聖僅稱他在1683年10月3日收到該條諭旨，根據郵遞所需時間往前推算諭旨從北京發出的可能時間點，是9月中旬左右。雖然實錄與起居注兩個檔案中都未見到該條諭旨的記載，但康熙與大臣曾在1683年9月17日討論並答覆姚啟聖的奏疏，可推測這份諭旨應在差不多時間發出。若是如此，那麼被指示即刻前往福建處理臺灣問題的滿洲欽差大臣蘇拜（？-？），便是在該諭旨發布的隔日被康熙召見。<sup>38</sup>

<sup>33</sup> 施琅，《靖海紀事》，頁43-45。

<sup>34</sup> 施琅，《靖海紀事》，頁41。

<sup>35</sup> 鄭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22年7月27日（1683.9.17），頁B007039-B007040。

<sup>36</sup> 關於鄭氏集團投降原因的分析，經濟無力也許是停戰主因，鄭維中從貿易數據證實夏琳在《閩海紀要》中提及的東寧（臺灣）早災。參見鄭維中，〈施琅「臺灣歸還荷蘭」密議〉，《臺灣文獻》，第61卷第3期，頁44-46。

<sup>37</sup> 姚啟聖，〈為請立洪遠規模以杜亂萌以光萬代事〉，收入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壹輯第八冊，頁423。

<sup>38</sup> 鄭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22年7月28日（1683.9.18），頁



那麼我們可以認為，康熙在得知鄭氏集團確定投降後，其反應與裁決可謂十分迅速。雖然看不出其心裡係傾向或棄或留，但至少可以明白，他亟欲知曉官員們對棄留的想法；因此，密集的棄留議論也於焉展開。

本節闡釋了清廷如何看待征臺行動，以及對鄭氏集團投降的反應。鄭氏集團投降前，出於長年用兵失利的經驗，康熙專注於攻打臺灣，並未公開回應施琅提出的臺灣後續處置議題；鄭氏集團投降後，因戰事確定可告一段落，規劃東南沿海、臺灣善後處置措施的討論，以及安插鄭氏集團等行動遂如火如荼地展開。對比過去習慣用施琅奏疏集《靖海紀事》劃分臺灣棄留議的歷史分期，由清代檔案重構的歷史中，可知朝廷主導了臺灣棄留議程的節奏。換言之，就公開的政治程序來說，臺灣棄留議乃是由帝國核心政治分子們所發起，而非福建地方官員。

### 叁、臺灣棄留議的政治過程

自1683年9月17日朝廷確認鄭氏集團投降之後，整個過程進入下一階段，朝廷開始密集地討論臺灣棄留議題。我們可以從廷議紀錄以及具有行政效力的文書等記載來推知臺灣棄留議的大致區間，並重構棄留議的政治過程。最早始於1683年9月下旬，或者如上一節推測的1683年9月17日，朝廷要求福建總督姚啟聖發表對臺灣棄留的看法；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1684年2、3月，康熙與明珠談及將治理臺灣，並指示李蔚帶著施琅的〈恭陳臺灣棄留疏〉與議政王大臣會議、詹事、科道確立留臺的政策方向。<sup>39</sup> 其中，透過對政治過程的細膩爬梳將會使我們注意到，棄留議的討論並非從棄到留的「單一直線過程」，尚須考慮康熙的交談對象差異，以及行政制度等影響，這使得結束時間並不明確。因此，本節將會提及與臺灣棄留議相關的若干官員與機構，除了釐清時序，也將嘗試分析當時北京朝廷議政氛圍的影響。

---

B007042。

<sup>39</sup> 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第114卷，康熙23年1月21日（1684.3.6），頁176a。

必須說明的是，本文對於臺灣棄留議完結時間的認定與過往研究者不大相同。過往研究大多將完結時間定位在1684年5月27日，蘇拜會同福建省級官員報告臺灣應設一府三縣。<sup>40</sup> 然而，從1684年2月3日康熙與明珠談話之後，朝廷已顯露統治臺灣的意圖。因此，「是否治理臺灣」的議題至此結束；接下來其實是「如何治理臺灣」的問題。後者涉及更多行政細節，例如從後來首任諸羅知縣季麒光的《東寧政事集》中的〈覆議二十四年餉稅文〉可以看到，蘇拜代表的朝廷中央為了臺灣稅額問題與福建地方官員多有爭執。<sup>41</sup> 此外，臺灣最終的統治方案「一府三縣」也未見於施琅的奏疏裡，施琅的〈恭陳臺灣棄留疏〉更像是將臺灣型塑成一軍事區域。這說明從決定治理臺灣，直到最終確立「一府三縣」格局之間尚有一段政治過程。<sup>42</sup> 不過，這些課題已經超出本文的範圍，留待日後探討。

以下示意圖為本節將要提及的事件，依西曆時間順序排列（圖1），以利後續討論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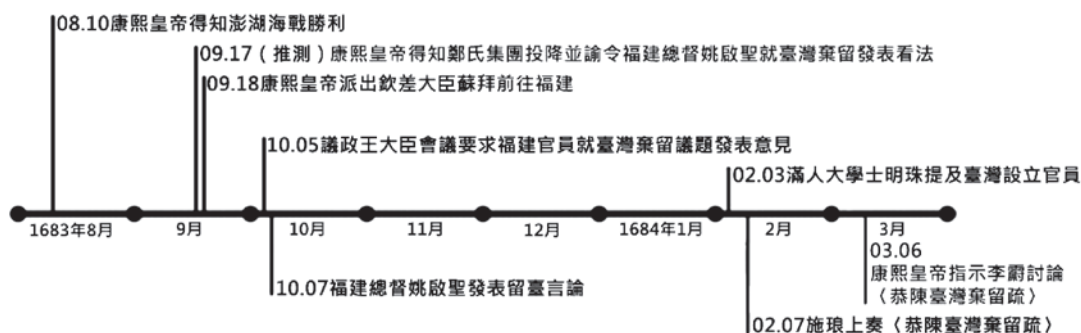


圖1、臺灣棄留議相關事件時程示意圖

首先，作為決策者的康熙在棄留議過程中的立場可說是十分堅定。鄭氏集團

<sup>40</sup> 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第115卷，康熙23年4月14日（1684.5.27），頁191b。

<sup>41</sup> 季麒光著，李祖基點校，《東寧政事集》（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158。

<sup>42</sup> 有關臺灣的軍事管制，清朝在宣示統治臺灣後，康熙曾要求李光地與明珠等人討論此事，李光地的想法與施琅亦不相同，最終則採納了李光地的辦法。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榕村續語錄》，頁710。



投降之初，康熙關注的是更大的東南沿海善後課題，這之中也許包含了臺灣棄留的問題。在臺灣的鄭氏集團已經投降，聽候安插，臺灣成為朝廷的囊中之物，對於後續該如何規劃才能防止亂事復萌，是清廷的首要任務。為此，康熙積極籌劃東南省份的展界事宜，他認為此政策有利於平民百姓生存，以避免他們再次鋌而走險造成動亂。展界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包括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等地，康熙在上諭中提到：

此等事不可稽遲。著遣大臣一員，前往展立界限。應於何處起止，何地設兵防守，著詳閱確議，勿悞來春耕種之期。<sup>43</sup>

展界係指取消康熙初年實施的遷界政策。當時清廷意圖以遷界阻斷鄭氏集團從中國東南沿海取得物資，結果造成這些區域大規模土地拋荒，平民流離失所，嚴重打擊了清朝財政。<sup>44</sup> 土地開墾與農時密切相關，因此時已是年末，距春耕之時已不遠。很快地，就在兩天後，展界的詳細實施辦法已有了草案，顯現清政府對政策快速的反應。<sup>45</sup> 至少對康熙而言，東南沿海的展界政策，是征臺戰後處置的首要環節。

康熙對於戰後的政策規劃可謂十分重視。上節曾提及其賦予福建地方官員人事任命權一事，後來施琅即為此遭到彈劾，因為他選用了背景有問題之人任官。康熙在與大臣談及此事時，認為這是戰爭期間的必要之惡，在接下來的承平日子裡，他不會再賦予地方官員人事任命權。朝廷期許這些政策能使閩臺海域恢復平靜，而能「無有如臺灣之事也」。<sup>46</sup>

此外，討論康熙如何思考臺灣問題時，統治成本較少為研究者關注，邵式柏

<sup>43</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22年10月19日（1683.12.6），頁B007372-B007373。

<sup>44</sup> 謝國楨，〈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考〉、〈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補考〉，皆收入氏著，《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頁198-232。

<sup>45</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22年10月21日（1683.12.8），頁B007377-B007379。

<sup>46</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22年12月13日（1684.1.29），頁B007564-B007565。

（John R. Shepherd）的研究提醒我們此一面向的重要性。<sup>47</sup>因應新版圖而新增的文武官配置，將帶來糧餉、國防等問題，都是統治者必須考量的課題。當時的清朝財政應該不甚寬裕，自入關以來，長年軍事行動導致支出浩大。順治皇帝（1638-1661，1643-1661在位）統治的末期便曾與大臣討論國家的財務狀況：

國賦不足，民生困苦，皆由兵馬日增之故……。合計天下正賦止八百七十五萬餘兩，而雲南一省需銀九百餘萬，竭天下之正賦，不足供一省之用。<sup>48</sup>

康熙從他的父親手中接下財政拮据的國家，接著又爆發三藩事變，可想而知，長期戰亂將引起稅收體制不良，以及龐大的開支。具體的數字可以根據殘存的戶部存銀數據得知，在討論臺灣棄留問題前，1678年存銀僅有3,339,920兩，到了1686（康熙25）年來到26,052,735兩。<sup>49</sup>因為檔冊霉爛的關係，我們缺乏1679至1685（康熙18-24）年的數據，但大概可以明白清朝財政的拮据。總的來說，對康熙而言，戰爭善後的長治久安與統治成本問題，是他首要的考量目標。在這個背景下，他多方探問大臣意見，謹慎地評估臺灣棄留一事。

此時福建總督姚啟聖也注意到國家的財政考量。康熙在1683年9月左右同意鄭氏集團投降後，隨即要求姚啟聖回報對臺灣棄留的想法：

若海賊誠意投降，令剃髮登岸，作何安插及臺灣或守或棄之處，奏聞。<sup>50</sup>

隔天，康熙派遣蘇拜前往福建。蘇拜此行原本的目的是為了協理福建軍餉的

<sup>47</sup> 邵式柏（John R. Shepherd）著，林偉盛等譯，《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

<sup>48</sup> 鄂爾泰等修，《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第136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順治17年6月12日（1660.7.18），頁1054a。

<sup>49</sup> 從現存的檔案可以算得康熙年間戶部存銀的平均數為33,842,661兩。呂堅，〈康熙朝戶部銀庫歷年存銀數〉，《歷史檔案》，1984年第4期（1984年11月），頁19-21。感謝審查人提示此資料。

<sup>50</sup> 姚啟聖，〈為請立洪遠規模以杜亂萌以光萬代事〉，收入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壹輯第八冊，頁422-424。

調度，現下則是為了因應鄭氏集團的投降及協理其安插事宜。康熙特別提醒他籌備軍需，以及妥善安插鄭氏集團兩件事，同時表明不宜讓鄭氏集團成員滯留臺灣。<sup>51</sup>此時姚啟聖在收到康熙要求討論棄留問題的諭旨後，一次上陳了八本奏疏，期望徹底整頓東南沿海，其中一本便直指將臺灣納入版圖。姚啟聖的說法頗為詳細，他稱：

臣亦聞議者皆以為臺灣實難攻克，即得亦實難守，臣非不知也。……若臺灣又作賊巢，勢必波及東南沿海，後患無窮。……舉粵東之瓊州〔海南島〕、江南之崇明〔崇明島〕，其能援例而守臺灣。……況臺灣廣土眾民，戶口十數萬，歲出錢糧似乎足資一鎮一縣之用，亦不必浪費國帑。<sup>52</sup>

姚啟聖在奏疏中表明，雖然臺灣難攻難守，如今既已攻下，若不納入版圖設官治理，勢必無法長治久安；另外姚啟聖也就朝廷可能關心的海島治理困難與耗費成本做了初步剖析。該引文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臣亦聞議者」一句，姚啟聖應該是在暗指有反對聲浪存在；可惜我們無法從現存史料中得知姚啟聖所指為誰。有意思的是，「議者」一詞也出現在施琅的〈恭陳臺灣棄留疏〉裡面，似乎總有「一群人」反對將臺灣納入版圖，而我們卻無法在任何紀錄中找到這些人。

姚啟聖也向康熙請求批准他前往臺灣，與施琅共商臺灣棄留事宜；無論姚啟聖動機為何，他表現出盡早解決此事的態度，之後甚至又上奏了一份關於臺灣現況的詳細調查。<sup>53</sup>然而，姚啟聖的奏疏卻遭康熙駁斥。從姚啟聖的處境來看，原因也許可以歸納為以下兩點：其一是姚啟聖與施琅爭功之事越演越烈。官員們在戰爭前線爭功一向為康熙所不能忍，他在征臺之前剛剛處理完雲貴總督與兩廣總督因征討吳三桂（1612-1678）而起的軍功爭執；<sup>54</sup>上一節已提及康熙認為征臺

<sup>51</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22年7月28日（1683.9.18），頁B007042。

<sup>52</sup> 姚啟聖，〈為謹陳因革損益之至要仰祈皇上特賜乾斷采擇芻蕘事〉，收入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壹輯第八冊，頁412-426。

<sup>53</sup> 姚啟聖，〈諮訪臺灣利弊〉，收入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二輯第五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頁342-350。

<sup>54</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4冊，康熙22年閏6月8日（1683.7.31），

之功屬於施琅，因此見到姚啟聖自稱與施琅協同進剿時，大為不滿，直言：「朕觀姚啟聖近來行事，頗多虛妄。」<sup>55</sup> 其二是姚啟聖改革建議的八本奏疏遠超過其管轄範圍，提議將臺灣納入版圖的奏疏僅是其中一本；其餘一同上奏的八本奏疏中有兩本為〈為請復五省遷界以利民生事〉與〈為再請速開六省海禁事〉，奏疏所指的五省、六省即東南沿海的諸省份，這明顯已超出福建總督的職責範圍。<sup>56</sup> 地方大員在康熙面前高談闊論，挑動著清朝中央的敏感神經，人在北京的學士李光地觀察到：

上已心不懌姚，會姚二三日連上五六本，竟要更制立法，四海九州欲自重加整理。<sup>57</sup>

康熙之所以對姚啟聖不滿，應指他與施琅的爭執、攬功之事；而所謂「更制立法，四海九州欲自重加整理」所指的便是規劃沿海省份後續處置的奏疏。康熙對這些奏疏的反應是「這各本皆不准行」，<sup>58</sup> 等於全面地否決姚啟聖的提議。抑鬱的姚啟聖在兩個月後病逝。姚啟聖的意見是現存最早力主將臺灣納入版圖的紀錄，雖然最終隨著姚啟聖官途一同葬送，但其報告應該仍是朝中判斷棄留的參考依據。然而，就政治意義而言，因為姚啟聖已經過世，而且在朝中名聲不佳，故而將留臺功績歸之於姚並無太大效用，但此影響不容小覷，即便到了今日，我們所理解的清初臺灣史脈絡裡，很少人會提到姚啟聖對臺灣棄留議也曾起過作用。

康熙亦曾與學士李光地討論臺灣棄留問題。李光地為福建人，因平定三藩有功以及理學上的成就，深受康熙信賴。<sup>59</sup> 李光地在《榕村續語錄》中記錄了他與康熙有關臺灣棄留的談話，他說明臺灣遠在大洋之外不易管理，並表明從福建回

---

頁B006960-B006962。

<sup>55</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22年9月9日（1683.10.28），頁B007251-B007253。

<sup>56</sup>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壹輯第八冊，頁413-417。

<sup>57</sup> 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榕村續語錄》，頁720-721。

<sup>58</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22年9月9日（1683.10.28），頁B007251-B007253。

<sup>59</sup> 清國史館修，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703-718。

北京赴任時曾見過姚啟聖與施琅，並且「臣議論與之不合」。康熙則追問如何棄法，李光地答可交與荷蘭人，因荷蘭人「豈有大志耶？」康熙則反問此種處置可以維持多久的和平，李光地說：

〔李光地〕：「目下何妨，以皇上之聲靈，幾十年可保無事。」  
上〔康熙〕面問曰：「如此，且置郡縣。若計到久遠，十三省〔中國〕豈能長保為我有耶？」<sup>60</sup>

陳在正根據李光地言論與姚、施不合，指出他應屬棄臺論者；<sup>61</sup>但石萬壽則認為李光地是從反面諷諫康熙不應放棄臺灣。<sup>62</sup>然而，除非我們仍堅持歷史人物會貫徹棄／留立場，否則以石萬壽的說法來理解陳在正所根據的「臣議論與之〔姚啟聖、施琅〕不合」似乎也說得通，將之理解為李光地意圖從反面來激發康熙的疑慮。由是觀之，李光地的棄留立場將難以被證實，但同一段落的另一句話對於我們探討臺灣棄留議的本質來說也許更為重要，這是過往研究所忽略的。李光地提及：

〔若〕事久生變，到彼時置之不顧，便失疆土。與之爭利，或將不得人，風濤不測，便為損威，終非善策。<sup>63</sup>

在此，李光地將臺灣的治理提高到了清朝威信的層次，暗示著臺灣棄留的決策者將要承擔不小的政治風險，相信敏銳的康熙與各級官員也深諳此道。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已經生動地描繪出乾隆皇帝一意孤行統治新疆這塊新領土，對朝廷政治產生的影響。<sup>64</sup>有別於棄留立場，李光地揭露了臺灣棄留議另一個面向的政治意義，我們將在第四節討論這個課題。至此，除了財政考量以外，李光地讓我們意識到有些官員也注意到了新領土可能引起的政治風波。

<sup>60</sup> 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榕村續語錄》，頁709-710。

<sup>61</sup> 陳在正，《臺灣海疆史》，頁116。

<sup>62</sup> 石萬壽，〈臺灣棄留議之探討〉，收入林金梅主編，《漚汪·將軍·施琅——將軍鄉鄉名溯源暨施琅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6。

<sup>63</sup> 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榕村續語錄》，頁709。

<sup>64</sup> 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著，賈建飛譯，《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7年）。



然而，因為李光地這些發言的時間並不明確，目前我們難以定位他在臺灣棄留政治過程中的位置。陳在正根據李光地自陳「海上初平時，予赴官進京，上即問曰：『如今臺灣已平，姚啟聖、施琅欲郡縣其地，如何？』」認為是在姚啟聖與施琅奏陳意見後。雖李光地曾言其「海上初平時，予赴官進京」，但也非具體時間，理論上是澎湖海戰勝利之際，但當時姚啟聖尚未對朝廷提出留臺意見；且當時施琅人已在臺灣。目前僅知李光地於1682（康熙21）年6月底請假回到福建，但何時回到北京則未有紀錄。<sup>65</sup>另一方面，從史料性質來看，《榕村續語錄》可能有太多的變數。此書除了是事後回憶之作，由李光地之孫纂輯外，李光地過世前也明確表示這些紀錄需要經過適當修改；此外，再加上根據校對者的考證，其成稿時間約在1743至1756（乾隆8-21）年之間，距離臺灣棄留議已逾一甲子。<sup>66</sup>該書記載可能有失準確，又無附註日期，受限於這樣的史料性質與內容，使我們無法有把握地將李光地定位到棄留議的時序上。

李光地之弟李光坡（1651-1723）也曾被康熙問及臺灣棄留的議題，他稱：

臺灣既平，〔康熙〕詔督撫大臣籌度機宜，光坡謂防海之道，有慎設其守者，有探止泊而遏之者，有度要需而絕之者，因為策上之。<sup>67</sup>

這條材料過去較少受到注意，李光坡的發言更加貼近康熙保持東南沿海安定的目標。李光坡雖以其學問聞名於世，但終其一生未獲科舉功名。<sup>68</sup>這意味著，李光坡並非以官員的身分接觸到訊息並提出自己的意見，也許他是透過其兄長李光地來進行。這也反映出康熙曾廣泛地探問戰後東南沿海規劃的妥適辦法，可惜此記載亦未註明時間。

雖然我們無從得知李光地、李光坡的發言時間，但他們的意見或多或少反映

<sup>65</sup> 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第102卷，康熙21年5月23日（1682.6.28），頁34b。

<sup>66</sup> 關於李光地的文集《榕村語錄》、《榕村續語錄》之版本與內容辨疑，可參考點校者陳祖武所撰之〈點校說明〉。見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榕村續語錄》，書首頁16。

<sup>67</sup> 清國史館修，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第17冊，頁5348。

<sup>68</sup> 沈鍾等纂修，莊成等輯，《安溪縣志》（臺北：臺北市安溪同鄉會，1967年），第6卷，〈選舉〉，頁35b；第7卷，〈人物上·理學〉，頁6b-7b。

了朝廷的想法。康熙除了下令福建總督姚啟聖發表棄留意見，同時也將棄留議交付議政王大臣會議，兩條路線分頭並行。議政王大臣會議是清初重要的決策機構，最初僅有滿人貴族可以參與，是滿人游牧政權制度的延續。<sup>69</sup> 在順治皇帝親政以後，逐漸納入滿洲、蒙古與漢軍等八旗勳貴，顯現其濃厚的貴族政治色彩，位階相當的高。議政王大臣會議參與的事務相當多元，在康熙前期重要事務都會命令此機構提出意見，該會議並不處理日常政務，僅在皇帝有需要時下令討論。在姚啟聖回報前，議政王大臣會議稱：

臺灣應棄應守，俟鄭克塽等率眾登岸，令侍郎蘇拜與該督撫提督，會同酌議具奏。<sup>70</sup>

侍郎蘇拜即是前述康熙派遣的欽差大臣，此時的他人已在福建；該會議認為可由福建地方提供意見。康熙核准該會議的決定，此時是1683年10月5日。有些學者認為這條材料指出將臺灣棄留的討論權，授予了福建地方官員。<sup>71</sup> 但從康熙同時要求福建總督發表意見來看，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意見，僅是康熙多方徵詢的一環而已。事實上，議政王大臣會議曾在鄭氏集團安插與東南沿海善後等課題上缺乏主見，屢次欲將主導權交與福建地方官員，而遭康熙斥責：「此事所關甚大，議政王等應即商酌妥確，如何復諉蘇拜等定議？」<sup>72</sup> 顯然康熙認為清朝中央與八旗貴族們，應該緊抓主動權，不應該下放給福建的地方官員。

姚啟聖被冷處理的幾個月內，朝廷均未有臺灣棄留議論的相關紀錄，唯有1684年2月3日提及即將統治臺灣。但一個月後，施琅的〈恭陳臺灣棄留疏〉送達北京，3月6日，康熙與李蔚的談話說道：

上〔康熙〕問大學士等曰：「爾等之意若何？」

李蔚等奏曰：「據提督施琅奏云：臺灣有地數千里、人民十萬，棄之必

<sup>69</sup> 杜家驥，《八旗與清朝政治論稿》，頁344-346。

<sup>70</sup> 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第111卷，康熙22年8月15日（1683.10.5），頁139b-140a。

<sup>71</sup> 鄭維中，〈施琅「臺灣歸還荷蘭」密議〉，《臺灣文獻》，第61卷第3期，頁35-74。

<sup>72</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22年9月18日（1683.11.6），頁B007273-B007274。



為外國所踞。奸宄之徒竄匿其中，亦未可料。臣以為守之便。」

上曰：「臺灣棄取所關甚大，鎮守之官三年一易，亦非至當之策。若徙其人民，又恐失所。棄而不守，尤為不可。爾等可會同議政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再行確議具奏。」<sup>73</sup>

如果我們將臺灣棄留議看作是單一的直線過程，那麼在1684年2月3日康熙與明珠談及將治理臺灣後，卻又詢問李蔚等人關於施琅〈恭陳臺灣棄留疏〉的想法，就顯得相當矛盾。但恰似這個情況，反而能讓我們清楚地觀察北京朝廷的狀況。從本節的討論來看，留臺確實確立於朝廷收到〈恭陳臺灣棄留疏〉之前，當時負責起居注的官員也在總結1683年的朝政時提到：

伏惟皇上御極之二十有二年，……今年六月，一鼓而下澎湖，聲威震聳臺灣，餘眾投戈頓顙，歸命恐後。海波不揚，鯨鯢盡息，蓋自古未登版圖者，咸沐浴聖澤於光天化日之下。<sup>74</sup>

這個「自古未登版圖者」即是臺灣，而李蔚等人的討論是在這之後的事。那麼該如何理解康熙與李蔚的談話？我注意到《清實錄》中的記載「上問大學士等曰：『爾等之意若何？』」，在原先的紀錄《起居注》中其實是：「上顧漢大學士等曰：『爾等之意若何？』」<sup>75</sup>這並非尋常現象，若我們翻閱同一時段的其他起居注便會明白，絕大部分時候康熙不會指明由漢人大學士來回答。在同一次對話中有關鄭克塽是否需要遣送北京一事，康熙則「又顧大學士等曰：『爾等云何？』」之後便是由明珠代表回答；這是比較典型的議政紀錄。<sup>76</sup>當時起居注每每記載到康熙向大學士詢問時，幾乎都是由明珠代表回答，而明珠是位滿人。

康熙的意圖也許是出於滿漢族群的考量，指名由漢人大學士李蔚將施琅的詳盡報告，以及皇帝的意志，會同議政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再次討論確立

<sup>73</sup> 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第114卷，康熙23年1月21日（1684.3.6），頁176a。

<sup>74</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頁B007606-B007607。

<sup>75</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6冊，康熙23年1月21日（1684.3.6），頁B007640-B007641。

<sup>76</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6冊，康熙23年1月21日（1684.3.6），頁B007642-B007643。

統治臺灣一事。一直以來，皇帝指示討論臺灣棄留時，都召開如此高層級的會議。<sup>77</sup> 過去康熙與滿人明珠談及此事，現在他要求漢人來帶領討論，將統治臺灣的整個政治過程，型塑成北京朝廷與福建等地不同群體的共識，而施琅的〈恭陳臺灣棄留疏〉在行政意義上的作用便在於此。過往以棄／留立場展開單一直線討論，容易讓我們忽略每位大臣、機構對於同一個議案有不同理解進度的事實，而誤解為單一時間軸的推進。

至此，我們可以簡單概括臺灣棄留議的政治過程：由廷議紀錄來看，最遲在1683年10月5日議政王大臣會議之際，臺灣問題仍未有定案；一直到明珠在1684年2月3日與康熙提及臺灣新設官員為止，這段期間朝廷擬出了留臺的政策方向。其中，清廷在鄭氏集團投降的一個月內便展開棄留的討論，反應之快，無法在《靖海紀事》裡看見。這段期間施琅的奏疏也僅是軍情報告，而未論及臺灣棄留利害。議政王大臣會議要求福建省級官員與提督等人討論臺灣棄留議題，但施琅並未在1683年11月與鄭氏集團成員一同回到福建，而是在1684年1月初。<sup>78</sup> 也就是說，施琅自滿足朝廷安插鄭氏集團的要求後，又在臺灣待了二個月才回到福建。也許是為了養戰時的眼傷，或者是占有臺灣的土地利益。那麼，若朝廷有意等待施琅的意見，以完善整個棄留議的評估資訊，便意味著施琅滯留臺灣的那二個月，變相拖延了棄留議的進程。然而，最終北京朝廷在等到施琅的〈恭陳臺灣棄留疏〉之前，便已先行決定留臺。收到施琅的奏疏後，康熙指名由漢人大學士李蔚再次確立留臺的政策大方向，並要求福建地方提出具體的治臺方案。

綿密地爬梳政治過程讓我們注意到，康熙曾諮詢過許多大臣，卻唯獨缺乏施琅。這也許是為了平衡有著重大戰功的施琅的角色。李光地曾向康熙論及施琅：「若論才略，寔無其比，至成功之後，在皇上善於處置耳。」<sup>79</sup> 李光地意在提醒等待臺灣事成之後，要多加提防施琅。雖不至於功高震主，但聲勢高漲的施琅極有可能對清廷在東南沿海的統治造成困擾。在臺灣納入版圖後，康熙也在廷議場合發表他對施琅的看法：「粗魯武夫，未嘗學問、度量褊淺、恃功驕縱，此理

<sup>77</sup> 關於議政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議政的情況，參閱徐明一，《清代六科行政監控機制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頁94-99。

<sup>78</sup> 施琅，《靖海紀事》，頁58-59。

<sup>79</sup> 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榕村續語錄》，頁688。

勢之必然也。」<sup>80</sup> 往後十餘年間，閩、臺等地的社會逐漸強化施琅的留臺功績與榮譽，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康熙的擔憂所言不假；第五節將談論施琅歷史印象的問題。事實上，康熙相當明白施琅的水師才能與臺灣知識，他曾告訴前往東南沿海展界的大臣：「施琅於沿海島嶼情形，無不悉知」，<sup>81</sup> 但因為施琅好大喜功的性格，便試圖避免施琅介入領土擴張這種功勞。這些行政過程與廷議紀錄也提醒我們，縱使施琅有著豐富的臺灣知識與康熙的信賴，但並不同於他實際地參與了議論過程。

臺灣棄留議被型塑成朝廷共識的過程引起我的好奇，既然棄留議是朝廷中廣為周知且重要的議題，那麼各個官員、機構等看似「個別單位」之間也許不是沒有聯繫；換言之，我們所看到的議論結果，可能是某些官員從中運作的結果，用以回應康熙的期望。我注意到，當時作為朝議核心的大學士們，有一半的成員自康熙親政以來便一直是他的堅定盟友，他們之間應該發展出了某種議政默契。<sup>82</sup> 再進一步仔細觀察參與議論的官員身分與彼此的關係後，發現棄留議的背後似乎存在著一套官員網絡，這套網絡正是以滿人大學士明珠為中心，他們有著共通的目標。為此，下一節將從北京朝廷官員網絡切入，嘗試分析臺灣棄留議之於北京朝廷的意義，以及這將如何反過來影響棄留議的推進。

## 肆、北京官員網絡與「臺灣」的政治意義

對於福建地方的官員如姚啟聖與施琅來說，臺灣棄留關乎地方治理的實際影響，也因此他們交出了相當具體的報告；但對於決策核心的北京而言，臺灣棄留議有著什麼樣的意義？從廷議紀錄中，我們注意到滿人大學士明珠屢次提及平臺

<sup>80</sup> 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第116卷，康熙23年5月11日（1684.6.23），頁205a-205b。

<sup>81</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22年11月11日（1683.12.28），頁B007470-B007477。

<sup>82</sup> 安熙龍（Robert B. Oxnam）著，陳晨譯，董建中審校，《馬上治天下：鰲拜輔政時期的滿人政治（1661-166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頁223；錢實甫編，《清代職官年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2。

功績，明珠與臺灣又有著什麼樣的關聯性？他的意圖為何？關於這些問題，施琅在北京的人際關係提供了一些線索。

1681年，施琅之所以被多位大臣舉薦擔任水師提督，除了水師才能外，他在北京的人際關係也十分重要。十三年前的1668（康熙7）年，因清朝與鄭氏集團的關係從戰爭轉為和談，於前線作戰的施琅遂被調回北京。<sup>83</sup> 普遍認為，施琅在北京的日子是他一生最困頓的時期。<sup>84</sup> 誠然，因為施琅在北京的活動幾乎沒有留下直接紀錄，也甚少受到研究者的關注；然而，倘若施琅在北京真的毫無作為，那麼為何能在1681年再次被朝中大臣薦用呢？施琅調回北京後歸入鑲黃旗、封伯爵銜、授予內大臣一職，應當十分有利於拓展人脈。這與日後施琅被薦用，並在征臺時獲得朝中全力支持應有很大的關係。

施琅逝世後刊刻的《靖海紀事》序文，提供我們窺探施琅在北京交際狀況的窗口。序文首篇的作者為翰林學士富鴻基（1634-1708）。富鴻基官至禮部侍郎，是施琅的同鄉。<sup>85</sup> 雖然富鴻基似無涉及臺灣棄留議題，卻是施琅建立人脈的起點。施琅經常至富家作客，並因此結識了同樣來自福建的李光地。據李光地回憶，他初次見到施琅時相當地輕視他，但幾次在富家聽施琅談論征臺策略後，逐漸對其改觀，轉而看重施琅的才能。<sup>86</sup> 因為缺乏材料的緣故，我們無從得知施琅是否曾透過富鴻基或李光地傳達他對臺灣棄留的想法，然而，施琅與李光地的親近關係，逐漸引起滿人大學士明珠的注意。

臺灣對明珠而言可能有著特殊的意義，有一段我們熟悉卻又經常片面理解的材料涉及此事。鄭氏集團投降後，明珠等官員欲加尊號於康熙，以讚美征服臺灣的功績：

〔明珠等〕：「九卿、詹事、科道，以海寇底定、天下昇平，請加尊

<sup>83</sup> 施琅，《靖海紀事》，頁4。

<sup>84</sup> 大部分有關施琅的著述中皆可見到這樣的描述。參見施偉青，《施琅評傳》（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7年）；周雪玉，《施琅攻臺的功與過》（臺北：臺原出版社，1990年）。

<sup>85</sup> 施琅與富鴻基二人皆為福建晉江人。參見〈富鴻基列傳〉，收入方鼎等修，《晉江縣志》，第9卷（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頁246下。

<sup>86</sup> 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榕村續語錄》，頁706-707。

號。」

上〔康熙〕曰：「加上尊號，典禮甚大。臺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因從未嚮化肆行騷擾，濱海居民迄無寧日，故爾興師進剿。即臺灣未順，亦不足為治道之缺。朕觀古來史冊，盛世無屢赦之事，此時雖頒赦加恩，小民未必均沾實惠。治天下之道，但求平易宜民而已。何用矜張粉飾。且吳三桂剿滅後，頒赦未久，今又以昇平行赦，殊覺太煩。」<sup>87</sup>

明珠等大臣欲以平臺功勞為由，上尊號與康熙，但遭到拒絕。尊號是清代帝王有特殊成就時，大臣們讚揚其功績的一種表現形式。1681年底，明珠與大臣們也曾以平定三藩事變為由上尊號，當時亦遭到康熙拒絕。<sup>88</sup>康熙也以不久前平定三藩事變後已大赦天下，故不適合再次行赦。在康熙拒絕後的隔天，明珠等人再次提起此事，稱：

〔明珠〕：「臣等昨遵旨傳諭九卿、詹事、科道諸臣，諸臣言臺灣雖在海外，乃以中國人歷年佔據，憑恃其險，侵擾沿海居民。……皇上威德加於海外，自古以來未有能及者，臣等非不知皇上以簡易之道治天下，不尚粉飾；唯皇上功德實越古昔帝王，非加上尊號，無以慰臣民仰戴之願，伏望勉從臣等之請。」

上〔康熙〕曰：「海賊乃疥癬之疾，灣臺〔臺灣〕乃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若妄稱尊號、頒赦詔，即入於矜張粉飾矣，是不必行。」<sup>89</sup>

儘管昨日被康熙拒絕，但明珠等大臣並未放棄，再次以九卿、詹事、科道的名義呈請上尊號。過去這條材料引人矚目的地方是康熙對臺灣的輕蔑評價；然而，從昨日的經歷可以推知，這大概是康熙為了再次拒絕尊號而刻意貶低征服臺灣的成就。令人在意的是明珠多次嘗試的意圖，為何他如此汲汲營營於提高征臺

<sup>87</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22年10月10日（1683.11.27），頁B007312-B007320。

<sup>88</sup> 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第99卷，康熙20年12月14日（1682.2.1），頁1246b-1248a。

<sup>89</sup>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22年10月11日（1683.11.28），頁B007320-B007327。



一事的重要性，並增加康熙的功績與榮耀？

明珠的身分及其所處的北京政治環境，也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1667（康熙6）年，時僅14歲的康熙扳倒鰲拜集團並實際親政，此後朝廷成為以索額圖（1636-1703）與明珠為首的體系。<sup>90</sup>明珠崛起之後，開始不斷地與另一位權臣索額圖鬥爭，此事當廣為朝中官員所知，清中葉親王昭槤（1776-1830）曾提到：「索額圖、明珠並相時，權勢相侔，互相仇軋。」<sup>91</sup>索額圖是位滿人貴族，為康熙初年輔政四大臣索尼之子，亦是康熙之妻孝誠仁皇后（1654-1674）的叔父。<sup>92</sup>三藩事變時明珠與少數幾位大臣支持康熙的撤藩決議，在平定三藩後逐漸成為康熙在朝政中的堅定盟友，索額圖派的官員則逐漸被排除出決策圈子。

明珠與索額圖兩人皆在朝中廣泛結黨以培植私人勢力。不同於索額圖傾向拉攏滿人，明珠更傾向廣泛地結交漢人。<sup>93</sup>如此，擊敗鄭氏集團、占領臺灣似是明珠增加自身政治資本的機會，而施琅再次出任福建水師提督一職，正是由明珠與李光地一同舉薦；<sup>94</sup>後來施琅欲排除姚啟聖干擾，奏請康熙准許專征時，明珠也在朝中支持施琅。明珠提高征臺成就的價值，便是暗指自身舉薦有方，抬高自己的聲勢。另一方面，明珠的話似乎也有幾分支持的意思，至少我們從未見到明珠反對留臺。滿人入關以前，皇太極（1592-1643，1626-1643在位）藉著纂修《清太祖武皇帝實錄》，頌揚了努爾哈齊（1559-1626，1616-1626在位）在開疆拓土上的成就，這也成為滿洲統治者追尋的精神。<sup>95</sup>明珠等官員若能撮合此事，將臺灣納入版圖，便是為康熙增添榮譽，將征臺的政治效益最大化。此外，倘若施琅等人的意見傾向留臺，那麼明珠在康熙面前順水推舟，亦可藉著臺灣棄留來拉攏漢人官員。

<sup>90</sup> 安熙龍著，陳晨譯，董建中審校，《馬上治天下：鰲拜輔政時期的滿人政治（1661-1669）》，頁231-234。

<sup>91</sup> 昭槤，〈索明二相博古〉，收入昭槤著，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第10卷（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325。感謝審查人提示此一資料。

<sup>92</sup> Arthur W. Hummel（恆慕義），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Vol. II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南天書局），1991), pp. 663-666.

<sup>93</sup> 閻崇年，〈明珠論〉，《滿族研究》，1987年第1期（1987年3月），頁20-27。

<sup>94</sup> 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榕村續語錄》，頁702-703。

<sup>95</sup> 佚名，〈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圖書季刊》，第1卷第1期（1970年7月），頁135下。

明珠的多重身分亦便於他操作許多政務，包括棄留議題。明珠在棄留議期間的身分是吏部滿尚書選入大學士，這使得他能影響人事的任命與布局。<sup>96</sup>雖然最終的人事任命權仍握於康熙手中，但皇帝的遴選名單上會出現哪些官員，是由吏部——也就是明珠所屬單位來決定；加上皇帝在遴選時又會經常詢問大學士的意見，這使得身兼二職的明珠對人事任命擁有很大的操作空間。<sup>97</sup>在《起居注》中，這樣的過程幾乎天天上演。

另一方面，明珠除了身居官僚體系要職外，在滿人的傳統組織上亦是十分重要的角色。前述屢次議論臺灣的議政王大臣會議，早在1662（康熙元）年便已規定滿洲尚書與蒙古尚書為議政大臣，意即身為吏部滿尚書的明珠也有權參與。<sup>98</sup>明珠除了是編制內人員之外，在實際運作上，原本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參與者多為滿人勳貴，但這些王公貴族在三藩事變期間大多率軍前往各地平亂，並不在北京。換言之，三藩事變期間留在北京的議政大臣明珠，便成了康熙共商軍國要事的對象，這表示明珠在議政王大臣會議中，擁有長久積累起來的地位與聲望，而不僅僅是「參與者之一」而已。那麼，我們應該可以推論，至少在三藩事變到臺灣棄留議期間，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意見，很可能其實是反映出明珠的想法。

明珠的職權與背景，不禁令人思考從征臺到棄留議期間的人事任命與明珠的關係。前述被康熙派遣到福建善後的欽差大臣蘇拜，在三藩事變期間曾與明珠一同支持康熙的削藩決議，可以想見他們在政治上的友好關係。<sup>99</sup>蘇拜在善後之際被康熙選為欽差大臣，也許是被明珠推薦，同時我們也可以推知，蘇拜抵達福建時必定帶來明珠的意見與朝中的狀況。就在蘇拜離開北京出發後，議政王大臣會議又決議讓蘇拜與福建官員等人討論臺灣棄留。<sup>100</sup>明珠在漢人無權干預的議政

<sup>96</sup> 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第一冊，頁19-23、179。

<sup>97</sup> 1688（康熙27）年明珠被郭琇彈劾時，罪狀之一便是：「內閣票擬，皆聽明珠指揮。」參見趙爾巽等撰，楊家駱校，《清史稿》，第32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251，頁9719。

<sup>98</sup> 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第6卷，康熙元年1月23日（1662.3.12），頁104a-104b。

<sup>99</sup> 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第99卷，康熙20年12月14日（1682.1.22），頁1246b。

<sup>100</sup> 鄭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22年9月18日（1683.11.6），頁



王大臣會議中亦能有效地扮演滿漢之間的溝通者角色，進而以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名義支持留臺建議。

綜合這些現象來看，我們幾乎可以描繪出這樣的一幅景象：康熙在北京朝廷多方諮詢臺灣棄留的意見，大臣們紛紛提出自己的建議；其中明珠為了在鬥爭中占有更多的政治資本，便藉著棄留議來抬高聲望。他的身分使他得以在議政王大臣會議與官僚體系兩邊布局，安排親近官員前往福建貫徹自己的意志，並藉著議政王大臣會議，使蘇拜與福建官員也擁有了臺灣棄留的發言權。明珠巧妙地藉著職位與制度，將臺灣棄留的議政過程型塑成經歷「合理」討論後成為整體官員「共識」的結果。

在這個脈絡下，知曉明珠用意的蘇拜，自然也會促使施琅成為共識的一環。因此，在福建與施琅開會時，便「表現」出「部臣〔蘇拜〕、撫臣〔福建巡撫金鉉〕未履其地，去留未敢進決」的模樣。<sup>101</sup> 這是施琅報告中所呈現的蘇拜，也是康熙眼中的蘇拜，但蘇拜本人的動向我們並不清楚。施琅在此指出蘇拜等人因未親身到過臺灣，而不敢做出決定，這種充滿個人色彩的報告恰恰能更真實地渲染出共識的氛圍。從史料的性質來考慮，相信施琅也明白這將在朝廷政治場域中發揮特別的功能，因為康熙與朝中諸多大臣將會閱覽此份奏疏。從廷議紀錄可以注意到，一直到康熙與明珠論及治理臺灣以前，施琅從未對臺灣棄留議題有過正式表態，但施琅卻是當時朝廷對東南沿海，特別是臺灣資訊的重要來源。因此，倘若臺灣納入版圖一事再加上施琅的背書，勢必能讓整個過程看起來更加完善。我們相信對施琅而言，臺灣納入版圖的意義，肯定與朝廷有所不同，因為他有著福建的地緣關係；但這無損於雙方的一致目標。礙於史料的缺乏，我們無法得知康熙是否知情，但個人懷疑，康熙或許明瞭明珠等人係如何運作的整個過程，這也許是他們的慣用手法。

總的來說，本節從明珠的身分、朝廷的政治脈絡與議政文化切入，為臺灣棄留議在北京朝廷的可能運作過程，做了一個試驗性的推論。本文認為，明珠等官員的網絡以及北京朝廷的歷史脈絡，實與棄留議的政治過程密切相關。由是觀

---

B007273-B007274。

<sup>101</sup> 施琅，《靖海紀事》，頁61。

之，從明珠與北京的角度來說，在議政王大臣會議要求蘇拜與福建地方官討論，或者上尊號於康熙之際，朝廷內部官員們已經凝聚出統治臺灣的想法，只是原本期望施琅也可以盡早表示留臺意見，以完善整個過程。當然，目前仍缺乏明珠藉著自身身分操縱議案過程的直接證據，然而，「成為共識」作為臺灣棄留議政治過程的特色可說十分地顯著，這點值得我們注意。

## 伍、臺灣棄留議歷史敘事的流變

從廷議紀錄與滿人大學士明珠的角色及作用來看，可知並非是施琅引導了臺灣棄留議的進程。這明顯與後來我們所熟知的施琅形象大不相同，那麼，今日的認知又是如何演變而來的？現行研究的說法相當接近日治初期學者伊能嘉矩的記錄，他寫道：

以親歷征服，建樹首功之靖海將軍靖海侯施琅，堅主留臺之意見，遂於康熙22年12月22日題疏詳陳棄留之利害。……此議終見獲准，康熙23年4月，遂發臺灣歸入版圖之上諭。<sup>102</sup>

上述引文可說是我們對施琅形象的普遍認知，伊能嘉矩除了指明施琅促成清朝留臺，同時也合併了「是否治臺」與「如何治臺」兩個議題，一併歸功於施琅。同時期的連橫也在《臺灣通史》中寫到：「廷議欲墟其地，靖海侯將軍施琅不可。」<sup>103</sup> 根據前述討論，臺灣棄留議並非如伊能嘉矩所說於1684年5月左右完結，而是在1684年2月3日左右已有定案。那麼施琅促成留臺說法係何時出現？也許沒有我們想像的晚，而是在清朝領臺的幾年後。

最初清朝官方記錄臺灣納入版圖的歷史時，並未特別提到施琅的作用。臺灣最早的一本官修方志是1684年纂修的《福建通志·臺灣府》，關於臺灣納入版圖的過程僅稱：「爰是廷議，設府一，曰臺灣，屬福建布政司；領縣三，附郭

<sup>102</sup> 伊能嘉矩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臺灣文化志》，上卷（新北市：大家出版、遠足文化公司，2017年），頁229-232。

<sup>103</sup>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頁60。

曰臺灣，外二縣曰鳳山、諸羅。」<sup>104</sup> 統治臺灣乃是由「廷議」推動。有意思的是，負責《福建通志·臺灣府》的福建巡撫金鉉，正是被施琅描述為「去留未敢進決」的那位撫臣。<sup>105</sup> 金鉉也未說明施琅的貢獻，這或能佐證上一節施琅以個人色彩強烈的〈恭陳臺灣棄留疏〉，在明珠、蘇拜指導下共同型塑「共識」的猜想。幾年後由首任臺灣知府蔣毓英（？-？）編纂的《臺灣府志》也稱：「廷議設府一：曰臺灣；縣三：附郭曰臺灣，外曰鳳山、諸羅。」<sup>106</sup> 到了1696（康熙35）年，由知府高拱乾（？-？）主修的第三本府級方志《臺灣府志》也繼承廷議的說法。<sup>107</sup> 該本方志收錄了施琅所著之〈平臺記畧碑記〉，該文提及：「遂以子月班師，奏請於朝為置郡一縣三」，說明自身在臺灣行政區劃建置上的貢獻。<sup>108</sup> 而同書收錄另一塊碑則強調施琅在臺灣棄留議中的作用，這塊碑並非施琅所著，而是由「合郡士民公立」。該碑提到：

然臺去內地千里，戶不啻十萬，或欲一朝議棄。無論萬家鳩鵲，買棹無資；即令囊空歸井，饑寒慘逼，輾轉不堪憐乎？況為南疆抗咽，鹿耳險於孟門，墟其地，保無逋逃淵藪、貽將來憂者？是以力請於朝，籍為郡縣。<sup>109</sup>

該碑記載施琅向朝廷力保留臺，最終設立郡縣的故事。施琅留臺一說也非全然空穴來風，在清朝確定統治臺灣後，施琅參與了在福州召開的臺灣行政區規劃的會議。<sup>110</sup> 該碑除了將留臺、行政區劃講成了同一件事，還以「合郡士民」的名義勒石，這表明民間人士正試圖大力提高施琅的重要性。<sup>111</sup>

<sup>104</sup> 金鉉主修，《康熙福建通志臺灣府》（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頁36。

<sup>105</sup> 施琅，《靖海紀事》，頁61。

<sup>106</sup> 蔣毓英主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7年），頁5。

<sup>107</sup> 高拱乾主修，《臺灣府志》，收入中華書局編，《臺灣府志三種》，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92。

<sup>108</sup> 高拱乾主修，《臺灣府志》，收入中華書局編，《臺灣府志三種》，上冊，頁1104。

<sup>109</sup> 高拱乾主修，《臺灣府志》，收入中華書局編，《臺灣府志三種》，上冊，頁1108。

<sup>110</sup> 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第115卷，康熙23年4月14日（1684.5.27），頁191b-192a。

<sup>111</sup> 有關民間人士藉著立碑與官員建立關係，可參見李文良，〈兩塊碑記為歷史再補白：讀

到了1717（康熙56）年，臺灣第一本縣級方志《諸羅縣志》開始將「合郡士民」碑的故事直接寫入〈建置〉裡，稱：「琅疏請留臺灣為外蔽，詔報可。」<sup>112</sup> 接下來的兩本縣級方志《鳳山縣志》、《臺灣縣志》也跟隨《諸羅縣志》的說法。1719（康熙58）年《鳳山縣志》稱：「琅因具疏，請留臺灣為四省之藩籬。」<sup>113</sup> 1720（康熙59）年《臺灣縣志》稱：「〔琅〕師撫臺灣，特疏請留。」<sup>114</sup> 這些歷史敘事的變化反應出臺灣士民的作用與影響；也反應出縣級方志在書寫上有更大的彈性，從而提出與府志不同的說法。概括地說，施琅保臺的說法並未出現在最初的方志裡，僅以碑文的形式收錄於1696年編纂的府志，最終於1717年被寫入縣級方志的國家沿革歷史中。

上述臺灣納入清版圖的歷史敘事的流變，也許是由一群擁戴施琅的福建士人促成。施琅《靖海紀事》裡有關臺灣棄留議的奏疏中，僅稱蘇拜、金鉉等官員「未履其地，去留未敢進決；臣閱歷周詳，不敢遽議輕棄者也」，<sup>115</sup> 並未明指蘇拜、金鉉等人執意棄臺，但在該奏疏後附的「附錄八閩紳士公刊原評」中，這些福建士紳直接宣稱：

臺灣削平之後，持議者莫不曰：「此一塊荒壤，無用之地耳，去之可也。」……公身歷其地，熟識情形，特疏懇留，條陳詳悉，為沿海計萬全，為朝廷圖治安，誠深且遠也。<sup>116</sup>

這段以福建士紳群體名義所下的評論，將施琅奏疏原文中兩位官員「未履其地，去留未敢進決」<sup>117</sup>，上升到了「持議者莫不曰：『此一塊荒壤，無用之地耳』」的層次，同時也強化了施琅在臺灣棄留議中的作用。有學者曾注意到1670-1680年代之間，姚啟聖與施琅兩位官員曾以編纂軍功奏議集的方式拉攏不

---

臺南大天后宮與施琅有關的兩塊碑記有感》，《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通訊季刊》，第10期（2008年4月），頁42-47。

<sup>112</sup> 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頁5。

<sup>113</sup> 李丕煜主修，《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3。

<sup>114</sup> 王禮主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5。

<sup>115</sup> 施琅，《靖海紀事》，頁61。

<sup>116</sup> 施琅，《靖海紀事》，頁62-63。

<sup>117</sup> 施琅，《靖海紀事》，頁61。

同群體的福建士人，以強化自身的勢力；其中，施琅的策略是拉攏福建菁英。<sup>118</sup>這些「公刊原評」的目的在於，福建士紳藉此證實並強化他們與施琅的關係，大概也為施琅所樂見。如此看來，有學者引用「公刊原評」的美溢之詞作為施琅獨具慧眼、看出臺灣重要性的佐證，似忽略了史料性質。<sup>119</sup>有意思的是，《靖海紀事》後來曾於1875（光緒元）年牡丹社事件後再版。當時臺灣之於清朝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施琅的後代子孫施葆修（1842-1893）重刊時，便強調施琅與臺灣的關係，他稱：

閩省距京稍遠，臺灣尤在海外，非親履其地，誰能遽悉情形。……非其地之悉隸版圖，孰與保門戶而固大局也？……是歲日本之役，余在都，蒙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諸公延問臺灣情形，並及先侯事蹟；余以靖海紀事對。<sup>120</sup>

這段19世紀末臺灣局勢的引文頗有借古喻今的味道，說明施琅對臺灣重要性的認識。如同17世紀末施琅在〈恭陳臺灣棄留疏〉中所強調的，在此，施琅「親履其地」的形象再次被凸顯出來，並重申施琅是臺灣知識的權威。大概可以看出，這些文獻在整個清代不斷地詮釋、強化施琅的貢獻，最終成為我們對施琅的歷史印象。

東亞的其他地區則有不同看法，以朝鮮為例，在這方面與福建、臺灣的歷史敘事呈現出強烈的對比。朝鮮方面也有臺灣棄留議的記載，其歷史敘事則較貼近北京朝廷的觀點。1685年朝鮮使臣出使大清帝國歸國後，向朝鮮國王說到：

〔大清在臺灣〕留兵三千，以守其島。又遣禮部侍郎蘇拜，往審島中形勢云。克塽歸順，誠非虛傳也。<sup>121</sup>

<sup>118</sup> 馬雅貞，〈滿洲尚武文化再檢視——以康熙朝創發方略為例〉，《新史學》，第30卷第4期（2019年12月），頁55-122。

<sup>119</sup> 石萬壽，〈臺灣棄留議之探討〉，收入林金海主編，《漚汪·將軍·施琅——將軍鄉鄉名溯源暨施琅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9-66。

<sup>120</sup> 施葆修，〈重刊靖海紀事序〉，收入施琅，《靖海紀事》，頁15。

<sup>121</sup>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第38冊（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73年），頁683-684。



這位使臣表明臺灣納入版圖一事乃是由欽差大臣蘇拜所料理，甚至指蘇拜曾到過臺灣島審視情況，這與《靖海紀事》中的蘇拜形象相當不同。而過了幾個月，朝鮮使者再度帶回有關臺灣的訊息，這位使臣談到他與滿人大學士明珠對話的內容，明珠告訴他：「鄭克塽已盡歸順，臺灣地方置一府三縣，禮部侍郎蘇拜，前秋下去安頓云。」<sup>122</sup>在此，明珠談及臺灣納入清版圖的過程時並未提到施琅，而是極力歸功於蘇拜這位屬於明珠派系的欽差大臣。

總結來說，這些記載展現出臺灣納入清朝版圖一事，因著帝國層級不同而有不同的說法。北京對外國使節宣稱這是蘇拜這位滿人欽差大臣的功勞；而福建、臺灣等地方則在稍晚將此功勞歸與施琅。對朝鮮而言，北京的觀點自然是更為重要，因此保存於朝鮮的史料中；而福建、臺灣的說法則在方志中保存了下來，呼應地方人士的期待。朝鮮與臺灣對於1683年臺灣納入清版圖的歷史過程保存著不同的歷史敘事，反應出這些群體的不同考量。

## 陸、結語

本文從朝廷的臺灣棄留議政紀錄出發，嘗試跳脫過往以施琅《靖海紀事》為主軸的思考框架。有別於過去強調的棄／留立場差異，本文注意到臺灣棄留議與北京朝廷的政治脈絡密切相關，並以此重新詮釋棄留議的政治過程。本文指出，北京朝廷積極掌握臺灣棄留的議政節奏，康熙接獲鄭氏集團投降的消息後，迅速下令福建省級官員討論臺灣棄留問題。然而，福建總督姚啟聖的妄為與朝中學士李光地的警告，使康熙與朝廷逐漸認識到臺灣所具備的政治意義。臺灣帶來的榮耀與不安，促使朝廷官員轉以「共識化」的方式型塑整個棄留議的過程，分擔責任的同時也更加耗時。1683年臺灣問題出現之際，北京決策圈正邁入以滿人大學士明珠為核心的時期，而康熙與明珠建立的長期議政默契以及明珠自己的職位身分，使他能藉著職位之便，派遣並授意欽差大臣蘇拜等人前往福建引導地方的討論。隨後福建水師提督施琅上奏頗富個人色彩的〈恭陳臺灣棄留疏〉，康熙即

<sup>122</sup>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第38冊，頁691-692。

指示漢人大學士李蔚帶著施琅的詳細報告與皇帝的留臺意志，與議政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一同會議，進而將治理臺灣型塑為北京與福建地方不謀而合的共同主張。

過去研究在治臺具體策略的討論上成果豐碩，相較之下，本文描繪的臺灣棄留議則呈現出高度的政治性。議政過程以及參與者的身分、層級，顯露出清朝的政治禮儀規範，這之中揉雜清朝入關以來在族群與政治的歷史脈絡。康熙多次將臺灣議題交與議政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以及刻意讓漢人大學士李蔚帶著施琅的〈恭陳臺灣棄留疏〉再次與會，都有著特殊的政治意涵與目的。此外，臺灣棄留議的過程也展示出北京朝廷處理地方議題的可能途徑與方法。臺灣作為一塊新征服領土，其重要性與政治意義引起各方高度重視。康熙必須顧慮日後朝廷在東南沿海以及臺灣的角色。後來施琅家族與福建、臺灣菁英對於棄留歷史的重新書寫，應驗了康熙的憂慮。身處帝國中央的明珠則力圖將功勞攬在朝廷，除了恭維康熙的功勞，也趁著國際場合強調滿人蘇拜的貢獻。這也讓我們注意到臺灣棄留議敘事在不同層級、不同地區可能存在著不同的作用，而不僅是東南沿海戰略與治臺政策的問題。

廷議紀錄與施琅《靖海紀事》的敘事落差，顯現出臺灣棄留議作為政治符碼的生命力。也許我們也在無意識的狀況下繼承了施琅《靖海紀事》以及清治以後福建、臺灣社會發展出來的歷史敘事，並將北京朝廷的紀錄揉雜進施琅的敘事裡。然而，當時北京朝廷有著其他的思考與行動目標，相信這般多層次結構也將延續到清代臺灣史的諸多政策及其歷史敘事中。



## 徵引書目

### 一、史料

方鼎等修，《晉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

王禮主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伊能嘉矩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臺灣文化志》，上卷。新北市：大家出版、遠足文化公司，2017年。

佚名，〈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圖書季刊》，第1卷第1期（1970年7月）。

李丕煜主修，《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榕村續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沈鍾等纂修，莊成等輯，《安溪縣志》。臺北：臺北市安溪同鄉會，1967年。

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季麒光著，李祖基點校，《東寧政事集》。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年。

金鉉主修，《康熙福建通志臺灣府》。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

施琅，《靖海紀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昭槤著，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第10卷。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第6、96、99、102、111、114-116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高拱乾主修，《臺灣府志》，收入中華書局編，《臺灣府志三種》，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73年。

清國史館修，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第3、17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二輯第五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

鄂爾泰等修，《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第136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3-16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壹輯第八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  
趙爾巽等撰，楊家駱校，《清史稿》，第32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蔣毓英主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7年。

## 二、專書

安熙龍（Robert B. Oxnam）著，陳晨譯，董建中審校，《馬上治天下：鰲拜輔政時期的滿人政治（1661-166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  
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著，賈建飛譯，《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7年。  
吳學明主編，《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第一冊。臺南：翰林出版公司，2018年。  
杜家驥，《八旗與清朝政治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周雪玉，《施琅攻臺的功與過》。臺北：臺原出版社，1990年。  
周惠民等編，《國民中學社會》，第一冊。臺南：南一書局，2019年。  
林乾，《康熙懲抑朋黨與清代極權政治》。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  
邵式柏（John R. Shepherd）著，林偉盛等譯，《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  
施偉青，《施琅評傳》。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7年。  
施偉青，《施琅年譜考略》。長沙：岳麓書社，1998年。  
徐明一，《清代六科行政監控機制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莊吉發，《清代史料論述（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  
陳在正，《臺灣海疆史》。臺北：揚智文化，2003年。  
陳碧笙，《臺灣地方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錢實甫編，《清代職官年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薛化元等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歷史》，第一冊。臺北：三民書局，2019年。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  
羅友枝（Evelyn S. Rawski）著，周衛平譯，《最後的皇族：滿洲統治者視角下的清宮廷》。臺北：八旗文化，2017年。  
Hummel, Arthur W.（恆慕義），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Vol.II.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南天書局），1991.

### 三、論文

- 孔立，〈康熙二十二年：臺灣的歷史地位〉，《臺灣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1983年9月）。
- 石萬壽，〈臺灣棄留議之探討〉，收入林金悔主編，《滬汪·將軍·施琅—將軍鄉鄉名溯源暨施琅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縣：臺南縣將軍鄉公所，2002年。
- 呂堅，〈康雍乾戶部銀庫歷年存銀數〉，《歷史檔案》，1984年第4期（1984年11月）。
- 李文良，〈兩塊碑記為歷史再補白：讀臺南大天后宮與施琅有關的兩塊碑記有感〉，《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通訊季刊》，第10期（2008年4月）。
- 李祖基，〈論施琅《臺灣棄留利弊疏》的背景與動機—兼談清初臺灣的官庄及武職占墾問題〉，《臺灣源流》，第66/67期（2014年4月）。
- 馬雅貞，〈滿洲尚武文化再檢視—以康熙朝創發方略為例〉，《新史學》，第30卷第4期（2019年12月）。
- 鄭維中，〈施琅「臺灣歸還荷蘭」密議〉，《臺灣文獻》，第61卷第3期（2010年6月）。
- 閻崇年，〈明珠論〉，《滿族研究》，1987年第1期（1987年3月）。
- 謝紀康，〈清季對臺政策的探討：從海禁到防臺〉，《臺南女院學報》，第24期（2005年10月）。

